



西安地方志

2012·第5期

(总第218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我们的村落

由《灞桥村史》说起 姚敏杰 (3)

萧何后裔发现地——萧家村 (5)

历代名人与西安

安史之乱与长安沦陷 (8)

学术交流

影响地方志书记述客观性的原因分析
..... 李秋洪 (14)

人物春秋

徐步市长 (17)

封至模先生二三事 封五昌 (18)

史料钩沉

我党最高领导人何时称“总书记”
..... (20)

1960年中国“被迫”登顶珠峰 (24)

周恩来总理一生为何事四次痛哭? (26)

杜甫地图志 (29)

《鸿门宴》:酒席座次是成心侮辱刘邦?
..... (31)

西安风情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九)——延平门 (34)

西安北客站 (35)

纸乡北张古镇廿四景 邹圣周 (36)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周至民间舞蹈“牛斗虎” 富小云整理 (37)

文史拾趣

洪秀全的“文才”有多高 (38)

中国古代十大雷人吝啬鬼	(41)
历史名流中的“高考移民”	(43)
古代的“医疗纠纷”	(44)
民国旗袍“进化史”	(46)
历史上“一语成讖”的巧合	(47)

志鉴动态

碑林区、莲湖区率先完成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	(48)
面对村落历史 重拾遗存记忆	(48)
阎良区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进展情况	(48)
未央区三项措施扎实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	(49)
蓝田县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进展情况	(49)
《灞桥村史》出版发行	(49)

知识窗

中国在北宋时期已存在慈善机构	(47)
“老头子”原来专指乾隆	(50)
元朝皇帝为什么没有陵墓?	(51)
“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由来	(51)
“万里长城”并非“一条线”	(52)
中国最早的城市是西周丰镐	(53)
古代的民办大学	(54)

历代诗人咏长安

《过骊山作》	(唐)杜牧 (55)
--------------	------------

解字

“竟”	(13)
“竞”	(40)

名句欣赏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等五句	(17)
--	------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责任编辑:宋亚颖 王文竹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由《灞桥村史》说起

◎ 姚敏杰

大约是2005年吧,时任灞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刘琦对我说,他想组织编纂《灞桥村史》。我当时在灞桥区政府挂职担任区长助理,分管文化工作。刘琦对我说此事,无疑是希望得到我的响应和配合。我略加思索便对他说,此事意义非同小可,也许当下不为很多人理解,假以时日,其意义必定会凸显出来。

时过境迁,我已于2007年调任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挖掘包括灞桥区在内的西安地情资源,服务当代社会建设,成了我夙夜所思、魂牵梦萦的本职工作。而把我的本职工作再度和《灞桥村史》联系起来,则是源于今年年初的一次项目论证。新任副处长、主持地情资料处工作的高长安建议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其想法和当年刘琦编纂《灞桥村史》的想法如出一辙,我立即表示支持并建

议他和灞桥区联系,和退休后担任灞桥文化学会会长的刘琦联系,以便取得一些直接经验。后来,《西安村落记忆》以其无可辩驳的文化价值,得到西安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成功立项。

正当我们紧锣密鼓地动员各区县积极为《西安村落记忆》组稿的时候,经过七年时间酝酿、编纂,一部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分上下两册的《灞桥村史》于2012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灞桥区这方面的工作走在了西安市的最前头。

为村落修志、记史的紧迫性,灞桥人是有发言权的。众所周知,灞桥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即是帝都长安的京畿之地。因为地处西安东大门,属于城乡接合部,纳入西安城市建设整体规划的时间较晚,所以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对较慢。随着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加

快,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古老的村庄实现华丽转身,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一座座高楼在村落原址上拔地而起。特别是在前两年筹办世园会期间,一些村落转瞬消失,附着在村落一砖一瓦的历史文化密码,也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再过若干年,后人想了解村落的历史,只能寻找健在的人,从残缺不全的记忆里,搜寻和勾勒村落的概貌。灞桥应该庆幸在抢救村落历史的问题上早走一步,这其中,始终保持对灞桥文化建设高度自觉的刘琦功不可没。

从灞桥启动并编成《灞桥村史》,我得到的启示有三点:一是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编修《西安村落记忆》。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于今年10月20日在天津援引官方公布的数字说,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无人知晓。“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冯骥才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因此,保护中国传统村落已经迫在眉睫。近年来,西安的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这就意味着传统村落的消失也随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护和记载,任其消失,我们将成为西安历史的罪人。二是各区县要遴选真正热心文化事业、具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人为《西安村落记忆》撰稿、组稿。刘琦长期在区县担任领导,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他本人又非常热爱文化工作,加之退休后有充分的时间保障,这就使得他主持编纂《灞桥村史》得心应手,如鱼在水。三是记载村落历史,要多措

并举,全面反映,突出特点。“多措并举”,是指不仅要有文字记载,还要有图照记录,有条件的还可有影像资料。“全面反映,突出特点”,是指对村落的记载,不仅要有统一的、规范化的共性要求,还要有突出村落历史特点的个性要求,力求全面准确、穷形尽相地反映村落的历史。《灞桥村史》在反映村落历史上,以文字记载为主,个别村落有图照,但显得较少。刘琦后来对我说,如果当初更早着手,多拍些照片,甚至对229个村落全部进行录像,意义将会更大;另外,《灞桥村史》文字记载追求要素的统一、规范,灵活性就显得不足,对村落文化特点的挖掘就显得不够。当然,瑕不掩瑜,《灞桥村史》作为《西安村落记忆》的先行者,其道夫先路的功绩,还是不容磨灭的。

好在《西安村落记忆》项目已经启动,灞桥区可以在《灞桥村史》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充实有关资料;其他区县要尽早动手,力求全面占有和挖掘村落中最有价值的信息资料。通过阅读这部书,使曾经生活在村落里的人们,能够找到灵魂栖居的场所;通过阅读这部书,使后人能够破译出潜藏在村落的历史文化密码,服务当代,泽被后世。

据冯骥才介绍,由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发起的传统村落调查和保护行动已经启动。目前已收到约12000条来自基层的反馈信息,下一步,专家委员会将根据这些信息,评定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制定传统村落保护标准和发展规划。也许,通过《西安村落记忆》提供的信息,我们西安市将会有更多的村落进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让我们拭目以待。

萧何后裔发现地

——萧家村

2002年,震惊全国考古界,轰动西安市民的特大新闻,即埋藏在地下二千余年的西汉美酒,在一单位工地施工时被发掘出来。时过千年,打开酒盖,仍散发着扑鼻的酒香,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热题。人们不禁感叹汉时酒工技艺的高超精湛。省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这一考古发现,使西汉美酒名噪一时。萧家村村民每谈起此事,都会感到由衷地自豪和无上的光荣。

其实,萧家村的故事还很多。现时人们只知道该村姓萧的人多,岂不知萧姓村民还和汉相萧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嘉庆《长安志》记载该村名为萧家村,因此,人们提起萧家村总写作“肖家村”是不对的。我们先来看2004年该村发现的一块明代墓志碑,刻“明故听选官泮涯萧君墓志铭”,共600多字。其中有“按萧氏长安大族也,其居西清街者尤显著,世传以为酈候之后”。该译作:萧氏是长安的大族,住在西清街的萧氏尤其显著,一般都传说是汉相萧何的后裔。

解放前,萧家村的先辈们就到汉长安城西查村附近的萧何庙和其墓葬地进行祭奠活动。据传,村上原

有良田百顷,是汉高祖刘邦给萧何的封地。最早的村名叫西清街,据推算,该村距今已有1853年的历史,而非地方志书上所写的“清乾隆年间建村”。

据史料记载:萧家村在唐代时已成为皇家禁苑,唐高祖李渊的宰相萧瑀就是萧家村人。隋炀帝的皇后萧皇后就是萧瑀的妹妹。萧皇后死于萧家村。

据村里年长者讲,村内东西门楼上除过镶嵌有“西清街”和“钟灵毓秀”几个大字外,门楼都是用石条和大城砖砌制而成,不但高大雄伟有气势,而且上面和旁边都建有巡夜的打更房。村四周都是用土夯筑的高大围墙



明代墓志碑刻“明故听选官泮涯萧君墓志铭”

●我们的村落●

(1964年后被拆毁),村内东西门旁有官碾2垛,户族中有私碾8垛。这就是老人们所说的“八垛十碾”。

村内当时只有东西两门通向内外,村外有四通八达的道路。村西门口有年久不详的古槐树一棵(现存),有关公庙一座,再向西有菩萨庙一座,占地两亩多,庙内有参天松柏三棵(此庙在1949年前后曾做过学堂,1964年被拆除)。村外西北角有三元宫一座,占地4亩多,为三进较大庙宇(1951年后曾作为小学)。村外西南角,有火神庙一座(已毁)。村东门内北侧有大王庙一座,东门外有无量庙一座(已毁)。村西北方向有墓冢四个(1964年前后被平)。村外东北角有土塔两座,塔旁地下有汉代皇家花园浇灌花木的砖管箍筑的流水管道遗迹(老人们都称这里以北为御花园子)。

村墙内原来整个村落占地总面积为150.05亩。2002年4月,村民萧秋马在村东南方向的土方施工中挖出了两块石碑,一块上篆刻有“明故听选官泮涯萧君之墓”,另一块上刻有“明故听选官泮涯萧君墓志铭”。

这两块出土的石碑所在地,就是萧家村萧姓村民每年清明节祭祖扫墓的墓地之一。其墓群前,当年置有石羊、石人、石马桩、石水槽等。墓群周围有权属萧姓共有的祭祖墓地5亩。清明节这天,萧氏家族原先集体祭奠祖先的墓地就在这里。在这里祭祀完后,又会一起前往汉长安城内西查寨的始祖墓地进行祭祖,此处墓地面积大,有石羊、石人、石马、石桩等,周围有15亩地租给当地人耕种。据说这里原来存放着萧氏家族的家谱(据说被蓝

田县萧家坡人收存)。另外,据老人讲,现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门前的两匹石马就是从村里搬迁到博物馆的。

2009年4月17日《华商报》刊登一篇题为“中轴线施工发现明代墓”的消息。在西安南北中轴线道路施工时,在方新村附近发现“此为明代萧公儒与妻子刘氏的合葬”墓志碑。萧公儒为萧何的后裔,其官职为明代按察使前监察御史,相当于正七品官员。

从以上史实,可推究西汉美酒的发现地和萧家村所在的位置,汉相萧何应是萧家村人的先祖。

萧家村人视这块墓碑为村宝,至今把它镶在村委会的墙壁上,它记载着萧家村的历史,记载着祖先的来历。村上一些寻根认祖的老人,还在奔波于萧氏家谱的搜集整理,以证明其是萧何后裔。

近现代,萧家村还出了两位知名人士——萧汉三和郭老大。

青年路的止园饭店是大部分西安市民所熟悉的,旁边的杨公馆是怎么来的?这有些人就不全知道了。它为何又叫“止园”?这还得从1911年辛亥革命说起。萧汉三,早年在西安市东关当学徒做生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省各地举行起义,他弃商从戎。北伐时期,追随杨虎城参加靖国军。1922年,北洋军阀刘镇华嵩军入陕围困西安,萧汉三随杨虎城的国民三军第三旅进驻西安,与西安市民坚守西安八个月,直至守城最后胜利。

萧汉三在杨虎城麾下任文书,后管军需。1939年,杨虎城被蒋介石解职后,感到蒋除异

排己,遂有意退隐,以免招来更大的祸患,萧汉三深解其意,便将自己在西安九府街(现在的青年路中段)的宅院 40 亩送给杨虎城作为公馆,杨居此后起名“止园”,取意“仅止于斯”。

“西安事变”时“止园”成为杨虎城作战指挥部。“西安事变”后,萧汉三对政界、军界心灰意冷,遂解甲归田,回到萧家村务农。1962 年去世,享年 84 岁。

郭老大,民国时曾任陕西凤翔县县长,20 世纪 70 年代在本村去世。本人书法有一绝,能用左右手同时在宣纸上书写。在凤翔、西安享有盛名,给村里留下墨宝数件,至今村民郭仲利还保存着其一幅作品,内容是“画人画手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历经千余年的变化,今日的萧家村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 世纪 60 年代,萧家村属马旗寨人民公社。1984 年乡建制恢复,萧家村成立大明宫乡萧家村村委会。1985 年 2 月,划归二府庄街道办事处管辖。2002 年 8 月,二府庄街道与张家堡街道合并,成立新的张家堡街道办事处,萧家村划归张家堡街道管辖。

现在的萧家村位于西安市北二环立交桥西南角,迎宾大道、公交六公司西侧,北距张家堡街道办事处约 4 公里。2008 年,萧家村有农户 360 户,人口 1400 人,土地 1168 亩。分为两个村民小组。1992 年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后,村中大部分土地被征用,至 2003 年年底,剩余土地不足 300 亩。为尽快发展集体经济,村委会开始投资房地产业,建起萧家新村住宅小区,4 幢住宅楼 25000 平方米。村委会

投资 2.36 万元,硬化全村道路 13150 平方米,安装自来水,修下水管道。第一村民小组以土地投入,与陕西省伊势威集团建成伊势威汽车销售城。村委会又自筹资金,盖门面房 19000 平方米,招商引资,建成汇能汽车配件城。第二村民小组与大明宫建材市场合资,建成城北轻工业批发市场。本村有私营、合办企业 10 家,挖掘机 5 台,装载机 2 台,汽车 20 辆,承揽村周边的土方运输。村中有旅馆 10 余家,村各街道有商店、食堂、五金水暖、服装、网吧 150 多家,已形成一个城中村集贸市场。截止 2007 年底,村经济总收入 41960 万元。2008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12000 余元。1998 年至 2000 年,被评为省市“小康示范村”。

2009 年,未央区委、区政府决定以城中村改造为龙头,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和收入来源城市化,用 3~4 年时间实施“百村城改计划”,萧家村也在列。

(本文选自西安市未央区城中村村史《记忆》)



安史之乱与长安沦陷

一、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 755~762)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这一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爆发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公元 755 年 12 月 16 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根源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粉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

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官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任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徇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嫉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安史之乱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

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

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廷”,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己,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衣，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軼，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 765 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二、长安沦陷

长安为大唐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的中

心，又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人口众多，建筑规整，名胜林立，繁华富庶。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一诗中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写出了宫城中早朝场面和大唐天子君临万邦的盛大气势。

开皇二年（582 年），隋文帝以著名建筑家宇文恺为都城建设总设计师，在汉长安东南修建宫城和皇城。第二年完工，定名大兴。唐王朝建立后，仍以大兴城为首都，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永徽五年（654 年），唐高宗委派工部尚书闫立德负责，在春、秋两季，先后修建唐城外郭城墙和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及城楼。其时，全城面积 84 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明清都城北京的四倍。且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全城划分一百零九个坊和东、西两市。正如白居易在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长安气势相当宏博。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更是达一百五十五米，比起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都毫不逊色。不难想象，当时来自世界的各国使臣，沿着如同广场一样宽广的朱雀大街前往大明宫朝觐大唐皇帝的时候，大唐无与伦比的强盛与国力，将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何等的震撼。

然而，在大唐玄宗皇帝仓皇出逃后，这座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

叛军攻下潼关后，安禄山命部将孙孝哲率兵，由潼关进逼长安。因为玄宗等早已离开长安，逃往蜀地，叛军如入无人之境。关中形势一片大乱，大唐开元、天宝盛世的长安气象

一去不返。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七,长安留守官员崔光远、边令诚等人,开诚纳降,孙孝哲率叛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京长安。这样,两京全部陷落入叛军之手。回想唐将封常清奋勇保护东都洛阳屡败屡战的往事,天下人这才意识到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哀。

安禄山一开始没有料到玄宗会如此之快即西去避难,所以进兵迟缓,占领潼关后,推迟十天进兵,好做攻打长安的充分准备。想不到长安不战而下,安禄山自然喜出望外。至此,安禄山伪署官属等,尽数虏掠了长安府库中的兵器甲仗、文物、图籍,宜春云韶乐队、犀牛大象、舞马,以及掖庭后宫也都被劫掠一空。安禄山窃据河、洛地区,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仍任命崔光远为京兆尹,派安守忠总领部队镇守西京。

孙孝哲是安禄山最宠信的心腹,喜欢专权用事,常常与严庄争权。安禄山派孙孝哲监督关中诸将帅的军队,张通儒等人都受他的节制。孙孝哲性情粗犷,处事果断,用刑严厉,叛军将领都十分害怕他。安禄山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数百人时,就派兵护送到洛阳。

到了这个时候,大臣们主动投降安禄山的不在少数,也有不少臣子是被胁迫投降。主动投降的臣子中,以唐故相陈希烈和郡马驸马张均、张垪兄弟地位最为尊崇,自然也最为引人注目。陈希烈因为晚年失去玄宗的信任,一直心怀怨恨,叛军一到,就与同样不满玄宗的张均、张垪兄弟等人投降了叛军。

六月十八,安禄山听说杨贵妃姐妹在马嵬坡被杀,大为遗憾。又想到儿子安庆宗被唐

朝处死一事,不禁无比痛恨,传令孙孝哲说:“除陈希烈,张均、张垪等已经投诚,应即来洛阳授官之外,其余尚在长安的皇亲国戚,全部处死,一个不留。”在中国历史上,报复和仇恨似乎总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

孙孝哲本来就杀人不眨眼,他接到安禄山的这一命令后,立即加倍执行,把搜捕到的皇亲国戚、王侯将相以及相关人员全部押到崇仁坊。先在崇仁坊设置安庆宗的亡灵,然后将这些人一个个剥光衣服,挖出心肝,用来祭奠安庆宗。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均遇害,就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杀得一个不留。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都被杀掉,总共八十三人。有的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以至血流满街。过了几日,叛军又杀死搜捕到的皇孙及郡主、县主二十余人。

安禄山任命投降的陈希烈、张垪为宰相,其余投降的朝臣都授以官职。至此,叛军的势力大盛,向西威胁陇州(今甘肃陇县),向南侵扰江汉(今湖北),向北占领了河东(今山西)道的一半。安禄山大有代替唐王朝、横行天下之势。

然而,叛军将领都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既已攻陷长安,便志骄意满,日夜纵酒取乐,沉湎于声色珍宝财物,再也没有向西进攻的意图。安禄山心也恋在洛阳,纵情酒色,贪图及时行乐,不思进取。这就为唐朝保存实力,伺机反攻提供了良机。

安禄山未能得到杨贵妃姐妹,便着力搜罗唐宫中的梨园弟子。由于安禄山留住长安的天宝年间,玄宗每逢大宴,先设太常雅乐助兴。稚乐班分坐、立两部。坐部乐工坐在堂前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演奏，立部乐工站在堂下演奏。雅乐过后，以敲击吹奏为长的番乐登场。接着是教坊新声和府县散乐杂戏，千姿百态，陆续毕呈。有时，宫女各穿新奇艳丽的衣服，出到筵前，清歌妙舞，媚态撩人。绝佳之处在于，每当酒酣意悦之际，司农卿就命御苑管象的牧人，引驯象入场，表演奇妙的象舞。

安禄山当年经常参加玄宗举办的各种宴会，也颇好这一套，飞觥畅饮后，便叫乐工们协奏献技。为了逼迫乐工们就范，还下令采取了“露刃持满以胁之”的卑劣手段。于是玉箫凤笛，金钟玉磬，羯鼓琵琶等器乐齐鸣。或吹或弹，或敲或击，实在是清音亮节，悦耳动人。

安禄山大乐，说：“我当日在唐宫侍宴，也曾听过几次雅乐，只是前番作客，尚受拘束，比不上今日作主这么快活。可惜李三郎（指玄宗）有美人儿（指杨贵妃）陪着，我却不及他那么风流。”有人阿谀说：“皇上要选美人儿还不容易？然而，如今娘娘（指安禄山小妾段氏）德容均备，比起杨氏姊妹还要好得很。”安禄山摇头摆手说：“不，不，未必，未必。”言语中充分流露出对杨贵妃美色的垂涎。后人因此说安禄山起兵作乱，一是要当皇帝，二是想得到杨贵妃。

段氏聪明美貌，向来受安禄山宠爱，他的三子安庆恩便是段氏所生。她听了这话，隐隐有些不安。此时，安禄山二子安庆绪已经被封为太子，这让段氏更加心中不快起来。

酒至半酣，安禄山又夸奖乐工说：“真好看，真好听。孤家向来虽蓄大志，只因李三郎待我甚厚，所以不忍，意欲待他宴驾了方始举事，我想杨国忠这厮屡次发我隐谋，激我做出

这些事来，正所谓富贵逼人。一起兵时，呼吸间得了二十四郡。想李三郎不知费了多少钱粮，用了多少心机，教成这班梨园子弟，自己不能受用。倒留与我们作乐，岂不是个天数。”这话是安禄山踌躇满志时说出来的，应该是真心话，可见杨国忠确实在促使安禄山谋反一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王维自己，也没有逃脱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灾难。此时此刻，他正被迫在安禄山手下为官。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王维感伤下吟诵雷海清事迹的这首诗竟然会成为他日后的救命稻草。人的命运亦如同历史的发展，某些意外和不经意的所为也可能起关键性作用。

玄宗抛弃臣僚子民，自己率先落难而逃，长安兵不血刃沦陷于叛军之手，标志着盛唐时代正式结束，但大唐江山的梦魇还远没有结束。

被乐工激怒的安禄山，立即以长安百姓曾乘乱盗抢国库为名，命叛军在长安进行大搜捕。叛军将卒乘机抢掠，百姓多数因此而家徒四壁。安禄山还认为难解心头之恨，于是又下令对百姓进行严刑逼供。结果搞得长安人心惶惶，百姓们更加思念唐朝。民间经常流传着太子李亨要领兵夺回长安的小道消息。有时只要一人大呼“太子的大军来了”，长安城中的人就会四散奔逃，街市为空。叛军一旦看到北方有尘土飞扬，也往往以为是唐军到了，惊慌失措，随时准备逃走。长安中的一些江湖豪侠，也时常暗中袭击叛军官兵，令叛军人心浮动。安禄山诏令南不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北不过云阳（今陕西富平东），西不过武功（今陕西武功），这让他更加气急败坏，下令史思明、阿史那承庆等挥兵攻打唐军控制的

城镇。

叛军每攻破一城，便把城中的妇女、财物甚至衣服抢夺一空。把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给他们担运货物，而把那些老、弱、残、病、幼都用刀挑死，并以此取乐。叛军兵威所到之处，无不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大多官僚、士绅、老百姓一听到太子李亨在灵武郡登基，都争相前去投奔，“相继于路”。而一些被叛军攻陷的州郡，叛军一来，军民无力抵抗，便一起投降，表示为安禄山守城。而叛军

一走，军民就奋起杀死留守的叛军部队，重新归顺唐朝。如此反反复复十几回，以至城镇都已经都成了废墟。如此可见，天下的人心依然向着唐朝。

后来唐朝能够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人心所向。对于天下的百姓们来说，回首往昔的繁华，唐朝依然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朝廷，他们期待朝廷能重新回到辉煌的顶点。然而，这一天再也没有到来。

· 解字 ·

竟



“神农竟不知。”这个“竟”字本为会意字。①是甲骨文的形体，上部的“言”（上古“言”与“音”同字）为乐器之形，下部是“人”，表示人奏乐。②是古玺文的形体，上部为“音”，下部仍为“人”，其义未变。③是小篆的写法。④为楷书的写法。

《说文》：“竟，乐曲尽为竟。从音从人。”许说实为引申义。“竟”字本义为“奏乐”，后引申为“乐曲尽”义。由此，又可以引申为“完结”、“終了”，如《晋书·谢安传》：“看书既竟。”这是说：看书已经完毕。曹操《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由“終了”又可以引申为“终究”、“究竟”，如刘禹锡《天论上》：“道竟何为邪？”这是说：“道”这个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呢？由此又可以引申为“最终”，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竟死于秦而归葬。”

边界为国境的終了，所以当“境”字未产生以前，“竟”作“境”用，如《左传·宣公二年》：“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是说：逃走而又不逃出国境，回来而又不讨贼，不是你又是谁呢？《商君书·徠民》：“竟内不失须臾之时。”这是说：国境以内不误一点农时。这个意义后世均写作“境”。

地方志记叙内容必须存真求实、客观准确,这是地方志工作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地方志的生命力所在。因而在地方志编纂过程中,应当将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要求贯彻在收集资料、编写资料长编、拟定篇目框架、撰写志书初稿、评议审查和总纂出版的全过程。但是,根据第二轮地方志编纂过程中的经验,依然存在诸多影响和制约地方志书记叙内容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两方面。

一、环境因素

影响志书存真求实、制约其记叙内容客观准确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工作进度因素、制度因素和工作条件因素等。

(一)工作进度因素,指影响编纂地方志书的政治环境。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人对地方志工作的态度和要求,特别是具体的编纂要求,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尤为明显。有的市县或承修单位领导在给予地方志工作条件保障的同时,要求编纂者将修志下限定为出版之时,以便将最近一届领导及其主要工作都能记载进去。有的领导不了解地方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急于求成,提出从启动起用两个月完成一部专志。这类要求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志的存史资政价值日益受到地方领导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又给地方志工作者选择人志资料和编纂带来诸多困难。尽管地方志秉持述而不论的原则,一般不对史实作评论,但是对史料的选择必然投射编纂

影响地方志书记述客观性的原因分析

◎

李秋洪

者的价值倾向。下限定得过近,就给编纂者客观选择史料和编纂造成困难。就目前的地方志工作领导体制而言,地方志工作机构和编纂者违背上级领导意图的可能性极小,特别是在记叙工作决策失误、干部队伍问题、社会问题和灾难事故等负面内容时往往因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而难以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而已。那种两个月要完成一部专志的“宏愿”,尽管热情可嘉,但难免有点类似“大跃进”式的空想。

(二)制度因素,指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工作制度对收集资料、编纂志稿、审查验收的影响。地方志要求资料翔实准确,但是,有些领域涉事敏感,对信息保密有特殊要求,应遵守相关档

案制度和保密制度。而且目前有关档案及保密制度也存在过时和未与时俱进的情况,这样就会给志书收集资料和编纂造成一定困难,不利于保证志书内容的客观准确。例如,某市志办希望市编制办协助提供资料核实市志稿中各单位机构的编制级别和编制人数,但是得到的答复却是上级编制办有文件规定不得公布各单位的编制数和级别等资料。显然,如果政府主持编修的志书连本地政府各组成部门的基本要素都不能记载,志书的存史功能就不知从何谈起。有的单位在车水马龙的临街大门早已挂有牌子,公之于众多年,但是该系统的保密制度却规定不得在媒体上公开该类单位的正式名称、级别等信息。于是

在志书里是否如实记载该单位的正式名称也成了一个问题。在修志工作中遇到此类问题较为普遍,协调解决也比较困难。

(三)工作条件因素。其涉及面较为广泛,如机构成立和变更情况、行政区域变更频繁、档案资料保存现状、工作经费和保障条件等。有的承修单位、部门或者新成立的市、县和城区,由于机构或辖区以及有关档案人员变更频繁,以至于档案资料中断或丢失情况严重,使得志书对某些重要领域的记叙无法保持内容的连续和完整,甚至难以成篇设章。某正厅级委员会 30 年来光是单位名称就改了 5 次,机构人员和职责调整更是频繁。直到 2009 年 12 月,广西第二轮地方志启动已经 10 年,该单位最新的机构调整还没有结束,机构“三定”方案尚未出台,究竟由哪个处室负责第二轮专志的编纂组织工作还没有定下来,因而也就谈不上进入实质性编纂阶段。该专志涉及 20 余个行业,而过去这些行业是有 10 余个对口厅局专管的;20 世纪 90 年代后改由各个行业办公室管理,前几年又撤销行业办,有的行业办领导甚至指示工作人员将历年积存的档案资料卖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些由其他行政区域调整划分区域而新成立的市县,其志稿在记叙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内容时,无法获得辖区内系统完整的统计数据。由于要补充各个时段城乡居民生活的资料,需要做社会调查,但又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员,最后往往只好付诸阙如,严重影响志书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二、主体因素

影响和制约志书记叙内容存真求实和客观准确的主体因素有编纂者的指导思想、名利观、个人偏好、知识结构、工作态度和能力等。

(一)指导思想。每部志书的凡例或编辑说明都会载明志书的指导思想,但有的编纂者在上级领导的要求下,将部门承修省级通志的专志理解为是编修部门志或者单位志,在选择史料、拟定篇目框架和编纂过程中,试图将志书编纂成以招商引资为直接目标的本地新闻报道类读物,或片面理解为是记录本届班子的政绩榜。这显然与地方志编纂目的和体例要求大相径庭。

(二)名利观。各地和承修单位在编纂志书时常常聘用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员参与编纂。他们在发挥自己经验和阅历优势的同时,也存在影响志书记叙内容客观准确的可能,即作为某段历史的当事人,他们的名利观、感情偏好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渗透到资料收集和志稿编纂中。例如有的编纂者由于年龄原因即将退休,试图赶在退休前完成本轮志书的编纂出版,以成就流芳后世的“功名”,不顾志书质量要求,极力赶工,置诸多史实和大量数据差错于不顾。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的,有的编纂者甚至为了赶年底单位考核评优,漠视质量,不顾志稿的篇目框架、资料准确性和系统性、行文体例等方面存在大量问题,反复要求审查放行,提前出版;有的编纂者将亲朋故旧所参与的甚至自己经历的事件勉强入志,或随意拉长篇幅,更是缺乏基本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操守。

(三)知识结构和编纂能力。编纂者的知识结构和编纂业务能力也影响着志书记叙内容的客观准确性。有的编纂者受个人知识结构所限,对不熟悉的篇章内容随意处理,眼高手低,连行文的重大差错或硬伤也未能发现。某城区志聘请两名高等院校退休教师参与编纂,这两位退休教师在编纂过程中,对有关内

●学术交流●

容偏好十分明显,送评的志稿中详细地记叙自己熟悉的院校内部管理、人员变更和参与地方建设情况,篇幅分量明显失衡。

三、增强地方志记叙内容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对策

第一,严格遵循地方志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指导思想。地方志编纂组织者必须经常强调质量是地方志的生命力所在。而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则是保证地方志质量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地方志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基本规范。每个方志人都应明了遵循存真求实原则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地方志编纂者要自觉地将这一规范要求内化为自己的品行和敬业行为,成为方志人的人格品行,并渗透到自己的修志行为之中。

第二,政府分管地方志工作的负责人要提高质量意识。地方政府承担编纂地方志的职责,主要体现在政府依法修志,对地方志工作给予重视和支持,具体地说就是“一纳入五到位,(纳入政府工作日程以及领导、机构、队伍、经费和工作条件到位)的要求。政府和承编单位分管领导尤应加强对地方志性质和知识的学习了解,掌握地方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广西于2009年7月举办了200余人参加的自治区各级政府分管地方志工作的负责人研讨班,自治区分管副主席亲自参加地方志工作研讨,并对各级政府分管负责人提出“三个一”的要求:走访一次地方志办公室,做一次地方志工作调研,解决一批地方志工作问题。对自治区地方志工作起到很大促进作用。政府领导人在给予宏观指导和工作保障支持的同时,对志书质量要求有客观认识,避免提出不切实际、可能影响地方志质量的要求。

第三,提高地方志队伍的素质。对于一部

志书的质量而言,志书直接编纂者尤其是总纂者的职业道德水准、质量意识和知识能力水平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杜甫《偶题》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写史修志者应该有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在选择史料加以记叙和编纂加工时,须持一种尽量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尽可能地避免个人功名利禄、感情好恶等因素对编纂工作的影响。

第四,严格把好志稿的评议和审查验收关。地方志机构审查负责人在评议和审查志稿时绝不能审“人情稿”、“关系稿”。对于未达到质量要求的志稿必须要求返工修改,直至合格方可签发同意出版的审查验收意见。自2008年6月以来,广西地方志办公室已经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地方志资料收集、评议、审查验收和出版的具体制度,严格地根据这些制度推进第二轮志书编纂工作。

第五,慎重决定志书的记述时限和完成时间。每一部志书的记述时限、资料范围、分工责任和完成时间等因素都与志书框架设计和志书质量息息相关。因此,应该慎重权衡比较后再做出决定。要按照质量第一的要求,做到既讲效率更讲质量,又好又快地完成编纂任务。

第六,积极协调,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沟通。要通过地方志法制建设,特别是地方法规和工作制度的完善,为地方志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畅通的工作渠道,减少或排除那些不利于提高志书质量制度的影响。还要积极跟有关方面协调沟通,争取他们对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理解,在资料、人力和时间等方面给予支持。



徐步市长

徐步(1913~1967) 浙江宁波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华中文协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

淮海区党委宣传科科长,《淮海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淮海区和胶东乳山工商局副局长、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四部教育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步先后任中共苏州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副书记,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副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南京市市长。1965年8月,徐步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市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和迫害,于1967年6月在西安逝世。

其间,邀请南京、杭州的园林专家指导,并派工作人员到南京去学习,确定国槐、雪松、法国梧桐、法桐和白杨等五大行道骨干树种,建成行道树绿化景观,今日西安的绿化风格与徐步市长有很大关系。

·名句欣赏·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

道:正义。至:至极,到了极点。亲戚:古指血肉相连的亲近家族。畔:通“叛”。

【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疢疾】——《孟子·尽心上》

德慧术智:道德、聪明、才智、本领。恒:经常。存乎:是由于。

【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大戴礼记·武王践阼》

倍:通“背”,背弃。崩:败坏。

【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贾:商人。深藏:隐藏珍宝。盛教:犹言“盛德”。

【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战国策·魏策四》



梅兰芳(右)与
封至模的合影

封至模先生二三事

◎ 封五昌

封至模先生是我的叔祖父,我管他叫“六爷”。自我记事起,他就从东关搬到南柳巷2号居住了。解放前后,每年大年初一,父亲总要领我到南柳巷去祭拜祖先,并给我五爷(封至模的哥哥封干臣先生)和六爷拜年(由于我父亲的生意在骡马市,因此平日有时也去过)。至今我还记得他家的大门框上钉有一个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上镌“封寓”二字;还有就是我六爷家有一个玻璃匣子,里面放着许多泥制的各式戏曲人物脸谱,常吸引我驻足观看。他老人家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子不很高,面目清秀,穿着得体大方,待人和善,说话斯文,一副很有文化修养的艺术形象。

应当说,我原来对我六爷的了解是很浮浅的,只知道他“喜欢戏剧”。近年来,通过学习有关资料和访问亲友,我才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秦腔文化丛书》中称:“封至模(1893~1974)是我国话剧运动早期开拓者之一,同时对京剧、豫剧,特别是秦腔艺术,在理论、教育、创作、实践和革新诸多方面,卓有建树,著名戏剧活动家、教育家、导演、剧作家。”现仅介绍他艺术生活中的几件事。

20世纪20年代初,先生在北京求学期间,结识了我国话剧先驱陈大悲、李健吾等,并参加了齐如山、梅兰芳等组织的国剧(京剧)社,从此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1931年,先生弃官从艺,应聘到易俗社任职,此间对易俗社乃至秦腔艺术的表演、导演,以及化妆、服装、舞台等方位的改革创新,均作出了卓越贡献。易俗社因之兴旺,当时被称为该社的“黄金时代”。《易俗社第三次报告书》特别指出:“吾社改革艺术,使行于本省者,即可通行于全国,其在至模先生乎!”

1938年日寇侵占华北后，无数难民逃亡西安，许多难童流浪街头，目睹此状，激起先生的爱国心，正义感，遂毅然放弃社会上高薪职务和易俗社的优厚条件，于1938年3月下旬的一天，与同道好友刘仲秋、郭建英、任桂林，邀集西安社会名流韩望尘、马平甫、马公弢、于君堂、康少韩、阎秉初等人，在南柳巷封寓开会，一致赞成成立旨在“振兴民族艺术，传扬华夏之声”的“夏声剧社”（京剧）。剧社下设夏声剧院（地址在竹笆市）和夏声戏曲学校（在东木头市，原省工商联故址）。由于封先生的威望颇高，被大家推选为董事长，并兼首任剧社社长、戏校校长、剧场经理、校刊总编。一身而五任焉，其劬劳可想而知。

夏声戏校招收的学生多系由沦陷区流亡到西安的穷苦孩子，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后来在各剧团体担任领导职务和骨干。如曾任上海京剧院副院长的齐英才、京剧著名导演马科，以及著名演员钱友忠、梁斌、谢蔚霏等。

值得一提的是，任桂林因被国民党当局指为“不法共匪，破坏抗战”，下令追捕，任得消息带领几名演员逃往八路军所在的二战区，后又到了延安，从事京剧改革活动。1939年，延安鲁艺平剧（即京剧）研究团（延安平剧院前身）成立，需购戏装，中组部派戏剧家阿甲和任桂林同志到西安购买戏箱（包括服装、鞋帽、道具、彩头等）。任接受任务后，自然想到了在西安曾与他共同创办夏声剧社的老友封至模先生。他们到西安后住在七贤庄“八办”，当时国共虽然联合抗日，但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是防范甚严。为了不使朋友为他们办事而受到牵连，他们换上便衣，才来到南柳巷封寓。封当时受省教育厅委托，正在为筹办陕

西省立戏剧专修班（后改为陕西省戏曲学校）而忙碌着，但对朋友购置戏箱一事仍慨然应允，并积极置办。封先生将戏箱买好后，并帮助他们检验包扎并装车起运，还另提供了许多戏剧资料。不料，他们离开西安不久，国民党西安警察局督察处的鹰犬们和保甲长，气势汹汹地闯进封寓，翻箱倒柜把家搜了个遍，还将封至模和封干臣一起带到警察局，分别关押审讯，警方施展了种种威吓利诱手段，总是打不开缺口。后经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张锋伯、马平甫等具保获释。

难以想象，当年在延安上演并被毛主席高度赞扬的京剧《逼上梁山》的全部服装道具，却是由封至模先生一手操办的；在“夏声”任教的许多文化教员，竟然是来自延安的革命青年。这种事当年自属绝密，然而事有凑巧，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封至模时查出，诚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啊！





我党最高领导人何时称“总书记”

“总书记”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也称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党的组织制度发展史来看,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非一开始就称“总书记”,而且,“总书记”也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称。“总书记”最终确立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一大”上被选举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职务并不是“总书记”

在党的早期历史上,陈独秀无疑是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是,对于他的领导职务的具体称谓,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长期以来比较笼统和流行的说法是:陈独秀是“一大”选出的首位“总书记”;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五任“总书记”。实际上,这些说法并

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陈独秀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6年中,随着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也发生了多次改变。具体情况如下:

1921年7月“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党员50多名,鉴于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所以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

1922年7月“二大”时,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7月“三大”仍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选出五人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总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为“总书记”。“四大”党章对“总书记”的职责进行了规定,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总理全国党务和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7年6月以后,由于“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其中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此,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些著作中也有把瞿秋白称为“总书记”的说法。但是,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会议档案资料证明“八七会议”设立“总书记”职务,故称瞿秋白为“总书记”,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称谓)。

从“六大”以后到“七大”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多次变化;“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1928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由此,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主席”这个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够起到党内最高领导人应有的作用,实际主持和负责中央工作的另有他人。此后至“七大”,中央领导机构和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许多变化,比较重要的有几次:

第一次是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受到极大威胁,9月间,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第二次是1934年1月临时中央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关于博古的职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博古从这次会议开始担任的是“中央总书记”。

第三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张闻天的职务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出大量的资料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第四次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

●史料钩沉●

会。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9月29日召开了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第五次是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都由毛泽东担任。

十二大”党章关于中央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决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

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样,在一个短时期内就出现了“总书记”和“主席”并存而且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

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中央组织制度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关于为何出现这个变化的问题,1982年9月13日胡乔木就此回答新华社记者时指出:“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很明显,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这样就更没有理由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此,“总书记”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正式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并不断完善。

我党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从以上我党组织架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我党实行的“总书记”制度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特别强调和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从历史上看,党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多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内最高领导人都由大会直接选举或决定,陈独秀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出现过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大的情况,如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就是如此。此后,随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组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总书记”最终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并都须经过选举产生。对此,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其二,1956年9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样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状况(后来又曾出现过这种状况),但这时的“总书记”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八届一中全会设立“总书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的。毛泽东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建议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说秘书长改当总书记,就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因此,邓小平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党内的“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其三,“总书记”虽是党内

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从“十二大”起的历次党章都对“总书记”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即“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因此在他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十二大”以后历次党章中都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1960 年中国“被迫”登顶珠峰

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现代登山运动，地点是在苏联。1955年，那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可他们没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鉴于中苏之间特殊的友邻关系，苏联提议，两国共同组队攀登珠峰。在苏联的帮助下，1956年中国有了登山队。

意外变化苏联人撤退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这样的反问缘于尼泊尔人的率先登顶。1953年5月29日，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

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尼泊尔是印度的附属国。印度人一度叫嚣，中国人从来没有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攀登珠峰陡然间成了一项庄严的政治使命。

按照中苏双方约定，两国于1958年选拔队员训练队伍，1959年正式攀登。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

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展开，可是，苏联政府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回回国。

三次行军损失惨重

虽然面对诸多困难，但1960年3月，200多人的队伍还是集结于珠峰大本营。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登山队计划步步为营，逐渐适应，分4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 6400 米高度，沿途建立 3 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 6400 米。完成既定任务后，队员撤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公路”，在 7007 米处建立营地。

按照计划，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 3 名队员在 8500 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此时全队共有 50 多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另外还有两名队员牺牲。

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此时入选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组长为登山队副队长许竞，队员还包括刘连满和贡布。

临危受命冲刺登顶

第四次行军是从 5 月 17 日开始的。6 天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和贡布 4 名突击队员到达 8500 米突击营地，屈银华亦率运输队员随后赶到。

5 月 24 日上午 9 点多，4 名突击队员向顶峰进发。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突然两次倒下。只能赶紧让运输队员屈银华顶替许竞参与冲顶，王富洲则临危受命担任突击组组长。

中午 12 点多，4 人来到“第二台阶”，这是一个高约 30 米的天险，平均坡度在 80 度左右。他们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约 6 米的峭壁，几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

最后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

锥，穿上保险绳，并利用保险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 3 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

刘连满在此处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行。在海拔 8700 米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继续向顶峰进发。此时天色已晚，3 人决定摸黑前进。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找不到路线，只能用手摸索着往上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3 人体力都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从 8700 米到登顶，上升 100 多米花了 10 多个小时。

登顶时间为 5 月 25 日凌晨 4 点 20 分，环顾四周，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无路可走，他们这才确信已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1960 年，我国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的 3 名英雄。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



周恩来总理一生为何事四次痛哭？

世人所熟稔的周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周总理。还有另一个不容易见到的周总理，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总理。他也曾泪水涌动、悲不自胜。

1942年7月：因父亲去世而哭

1942年6月底的一天，周恩来因患膀胱脓肿住进了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可是就在这时，周恩来的父亲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去世了。“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然而，周恩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

了。大家都知道瞒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恩来回红岩嘴。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恩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脚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

“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至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敢说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周恩来的身体一阵震颤，随即摇

晃一下。邓颖超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呜——”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1946年4月8日：热泪悼战友

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乘专机回延安。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叶挺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平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他的时间太宝贵。但是正因为遇险多，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的，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踱步。

就在这时，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非常明显。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

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但是，等来的却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王若飞等随机同志全部牺牲。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战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的，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他想抑制住泪水，独自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1946年10月28日：

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

1946年10月，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并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0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

●史料钩沉●

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有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据目击者回忆，周恩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和指责。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检讨写哭了

1958年，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

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后来大家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那天，周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庄严沉重地横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眨，再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敏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在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既有反省、思考；又有疑惑和信任、清醒与迷惘；还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定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蓦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杜甫地图志

今年是杜甫诞辰 1300 周年纪念,让我们顺着“诗圣”的足迹,缅怀这位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巩义东二里瑶湾出生地

公元 712 年,杜甫降生于河南巩县东二里瑶湾。此地背依笔架山,前临沃野,嵩、邙对峙,三河(黄河、伊洛、泗河)汇流。杜甫自出生共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余年,童年的教养和青年时期的游历经历为杜甫成为一代诗圣打下了基础。现存的杜甫故里是一个坐东向西、大门朝南的长方形院落,小青瓦门楼,院内坐西向东瓦房 3 间,硬山式灰瓦顶。大门外北侧临街房山墙上嵌有清代洛阳知府张汉草书“诗圣故里”碑。故居路口有碑楼 1 座,内立清代碑刻,正面楷书“唐工部杜甫故里”,碑楼北侧嵌清代石刻 1 通,为“唐工部杜文贞公碑记”。杜甫故里于 1962 年修葺后成立了纪念馆,郭沫若亲书“杜甫诞生窑”和“杜甫故里纪念馆”。

◆偃师首阳山婚后居所

杜甫二十岁之后的十年,大部分时间在外游历,脚步遍布今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地。直到 30 岁,杜甫从山东回到东都洛阳与杨氏成婚,在偃师县城西北首阳山下的尸乡亭附近建了几间窑洞居住下来,这就是常常在他诗中出现的“陆浑山庄”、“土娄庄”、“尸乡土室”。他在这里居住了大约 13 年,结识了李白、高适等挚友,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和《兵车行》《丽人行》等一批不朽诗篇。今天的偃师县杜楼村北仍保留有杜甫先祖、晋当阳侯杜预墓和杜甫祖父杜审言墓。另有一处据称为杜甫之墓,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所立,上刻有“唐工部拾遗少陵杜文贞公之墓”几字。

◆陕西杜公祠求仕之路

杜甫 35 岁时曾移居长安以图实现求仕之志。他曾长期居住在长安少陵附近,又因远祖杜预本是长安人,所以自称“少陵”、“少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诗集也以《少陵集》命名。然而杜甫仕途坎坷,在长安经历了应诏不第、干谒无门、生活困窘等重重挫折。如今的杜公祠位于长安区韦曲镇东的少陵塬畔。它北倚少陵原,南临樊川,祠内花草茂盛、环境幽雅。杜公祠是个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山门是仿唐代的砖木结构;院内有五个水泥砌的大花坛,祠院内有三间享殿,殿内供有杜甫泥塑坐像一尊。祠内最珍贵的文物是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 750 年)杜甫写的《俯太中严公九日南山寺》石碑的墨拓本,这是现存唯一的杜甫笔迹。展室墙壁上有《唐书杜甫传》、《杜甫年谱》、“杜甫足迹图”、“杜氏世系表”、“杜甫在长安行迹图”等。现杜公祠系清代重修,1960 辟为杜甫纪念馆。

●史料钩沉●

◆羌村杜公窑避难之地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在杜甫的诗歌创作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对杜甫的生活来说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随着时局不断恶化,杜甫一家随难民逃亡,历尽艰险,辗转逃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终于在鄜州西北三十里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羌村,为家属找到居住之地。杜甫携家在此居住了一年多,完成了《述怀》《春望》《月夜》《北征》和《羌村三首》等传世名作。如今的杜公窑坐落在羌村中间。这是一个由三孔砖窑组成的民居,它坐北朝南一字排开。由于风吹雨打和久未修葺,东边的那孔早已倒塌,西边的那孔也裂缝日宽,岌岌可危。中间的那孔虽稍好一点,但外墙内壁和窑顶均已斑驳脱落,无复当年的旧貌了。窑壁上的碑铭已不知去向,窑周围的八株古柏只剩下了枝枯叶稀的三株。

◆杜甫川勤王北上

杜甫把家人安顿在羌村之后,听闻唐肃宗在甘肃省灵武即位,便辞别家小,登程北上,去往灵武投奔肃宗。途中路过延州(今延安),暂住于延安七里铺。时隔不久,杜甫从延安启程,后来据说到达安塞芦子关时被反贼虜回长安,关进监牢。在狱中,他回忆这次陕北之行,写下了《月夜》《塞芦子》《望春》《三川观水涨》《玉华宫》《羌村》等名诗。后来延安人民为了纪念杜甫,在此修造了“杜公祠”。宋朝时范仲淹还亲笔题书“杜甫川”三字刻于石崖,今仍完整可辨。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门维修扩建,除恢复重修了原有祠堂、摩崖石刻、楹联外,还新建了亭台、展室、成为国内外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

◆成都杜甫草堂难得安逸

在成都生活的时期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

安定时期。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人蜀,在成都营建茅屋而居,称“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因曾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衔,而又被称做杜工部。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等名篇。杜甫草堂依浣花溪而建,草堂旧址内,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工部祠东侧的“少陵草堂”碑亭是杜甫草堂的标志性景观和成都的著名景观。

◆奉节杜甫西阁创作高峰

公元766年,杜甫告别成都的茅屋,举家移居夔州(今重庆奉节)。在夔州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杜甫完成了四百余首诗,如著名的《登高》《秋兴八首》等,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创造了一个艺术高峰。今人将白帝山下观音洞满愿楼改建为杜甫西阁,以为纪念。现在杜西阁唯一的遗址,便是一块残碑和一棵柚树。公元768年,杜甫乘船出三峡,一直在荆湘漂泊,直至公元770年去世。

◆邛山岭杜甫陵园息魂之所

对于杜甫去世后究竟陵寝在何处,国内尚有纷争,杜甫陵有八所之多。杜甫在湖南莱阳附近的湘江舟中去世无疑,43年后,又其孙杜嗣业遵其父嘱托,将杜甫灵柩归葬河南。如今巩义市康店镇康店村邛山岭上的杜甫陵园,据说是由偃师首阳山迁回,杜甫的两个儿子宗文、宗武陪葬墓侧,当地群众称“圣人三冢”。墓冢呈漏斗状,高约10米,墓周长约72米。四周遍植冬青和柏树,冬夏苍翠。冢前有石碑两通,高约2米。前碑楷书“唐杜少陵先生之墓”,后碑书“杜少陵墓”。



《鸿门宴》：酒席座次 是成心侮辱刘邦？

自古以来，酒宴饭局常常是政治大戏上演的舞台。

两千多年前，刘邦、项羽面对亡秦那只硕大的胜利果实，用一场宴会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矛盾冲突。而在太史公司马迁如椽巨笔的生动描述下，这场宴会不但成了史上最著名的饭局，也在中国人语库里成了阴谋、凶险的代名词。

项伯“一夜成六事”可信吗

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之所以为后人所知，全凭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传神描述。

司马迁的《史记》多处写到鸿门宴。但详略明显相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最详，长达 1605 字。《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哙列传》也有“鸿门宴”的记叙，都写得极简略。

长期以来，《史记》记载的可信性一直受

到怀疑和审视。经过专家学者们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大量古代实物的出土及其研究的结果，多方面证实了《史记》记叙的可靠性。

而《史记》叙事之所以受到怀疑，也和司马迁文学化的表述手法有关。《史记》是文学和史学尚未分家时期的著作，司马迁一些过度文学化的描写，有时也造成颇多不可解之处。就《鸿门宴》一篇而言，历代都有学者对其不可解处提出质疑，进而怀疑其真实性，甚至从根本否认有这个历史事件。

比如有人认为，文章开篇“项伯深夜告张良”一段，鸿门和霸上相去四十里，而项伯一

夜之间可以完成“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入见沛公”、“约为婚姻”、“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等六件事，殊不可信。

再如，文章最后刘邦在宴席上脱身逃走一段，究竟是骑马还是步走，还是先骑马而后步走？叙述得并不清楚。而刘邦嘱咐张良，等他从小路走过二十里回到军中的时候，再入宴席告诉项羽自己离开的事——让项羽枯坐酒席等待刘邦这么久，却一直没有查问，实在不合情理，而对刘邦不辞而别的严重失礼行为，项羽没有任何表示，也很难理解。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鸿门和霸上从小路走只有二十多里，项伯骑马急驰，从时间上看“一夜成六事”完全来得及。而刘邦酒席脱身，实际上是在项羽故意默许下才实现的，

●史料钩沉●

可以理解。

史料来源可能出自樊哙之孙口述

据日本就实大学学者李开元考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著《史记》，除了政府档案和文献资料而外，实地调查、访问查询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史记》列传的历史叙事，特别是在与司马迁父子时代相距较近的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的历史叙事中，有不少直接取材于事件当事人及其子孙的口述传承。

李开元认为，鸿门宴叙事的取材来源，司马迁没有明说。不过，分析鸿门宴的人物和描写，我们大致可以找到叙事的眼点，也就是当事人的目击者和口述者。考《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叙事，有名有姓的出场者共有 11 人。其中，项羽方面有项羽、项伯、范增、项庄、陈平共五人，刘邦方面有刘邦、张良、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共六人。刘邦方面六人中，夏侯婴、靳强和纪信三人一直留在项羽军军门外，没有亲历宴会。

通观鸿门宴一篇的叙事，可以明确看到叙事的立场在汉的方面。而在汉的六人当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张良和樊哙。张良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樊哙只是于中参入。不过鸿门宴叙事最为详尽生动的部分，无疑是樊哙闯入宴会场的描写；最为突出的英勇人物，无疑也是闯入会场的樊哙了。樊哙缓解危机于千钧一发，他与项羽间的对话应酬、音容举止，特别是拔剑在盾牌上切割生猪肩啖食的细节，非身临其境者传达不出来。以文章分析而论，鸿门宴叙事的眼点，也应当就是樊哙。

司马迁在《史记·樊酈滕灌列传》“太史公曰”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

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意思是说：“我曾经到过丰沛，访问当地的遗老，观看原来萧何、曹参、樊哙、滕公居住的地方，打听他们当年的有关故事，所听到的真是令人惊异呀！当他们操刀杀狗或贩卖丝缯的时候，难道他们就能知道日后能附骥尾，垂名汉室，德惠传及子孙吗？我和樊哙的孙子樊他广有过交往，他和我谈的高祖的功臣们开始起家时的事迹，就是以上我所记述的这些。”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 145 年），其时，樊他广已经做了六年舞阳侯。司马迁问丰沛，是在他二十岁第一次旅行时。若以樊他广二十岁嗣侯计算，他比司马迁大二十六岁，此时四十六岁。樊哙鸿门救驾的事情，是樊哙家子孙后代世世相传的光荣历史。可以想见，司马迁从樊他广处听到鸿门宴的详情叙事，后来，当他撰写《史记》的有关章节时，就将樊他广的口述作为重要史料。

酒席座次是成心侮辱刘邦？

著名学者余英时在《说鸿门宴的座次》一文中认为：鸿门宴的座次“是太史公描写鸿门宴中极精彩而又极重要的一幕……太史公详述当时座次绝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

关于酒席的座次，《项羽本纪》中有十分具体的交代：“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旁征博引地证明：“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余英时在做了一些考据后，认为在秦汉宴会东西南北四向皆涉及的情况下，东向最尊，南向次尊，西向为“等礼相

亢”的朋友地位，北向为最卑的臣位，所以刘邦北向坐是表示臣服的意思，而项羽也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

清华大学学者李飞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费晓健则认为，余英时的考据有误，“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战国秦汉时的通义，而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场景，在君臣位中最卑的北向，在宾主位中也没有了臣服的含义。而鸿门宴中座次的尊卑，还是以司马迁记叙的次序，依次应是：东向、南向、北向、西向。

鸿门宴中刘邦是客人，并且曾经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如果项羽尊重他，就应按“宾主位东西面”的宾主之礼让他东向坐，如今让他退为“三等”北向坐，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范增。在一些中学教材的教师参考材料中，也认为这座次是项羽安排的，表现了项羽不把刘邦放在眼里，妄自尊大、骄横无礼、以势压人的傲慢自负心理。

然而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学者许锡强认为，刘邦到鸿门来是为谢罪而不是赴宴。在项羽面前他早已失去了主客相称的平等关系。项羽率兵钜鹿一战击败秦军主力后，威望大增。“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由此可见，当时项羽不仅早已成了楚军统帅，而且还成了抗秦联军统帅。项羽待刘邦以属下视之，是合情合理的，并非存心轻侮。

鸿门宴上项羽该不该杀刘邦

一席鸿门宴，引发后人最大争议和感叹的，还是项羽放走刘邦，到底是丈夫义举还是妇识短见。

主流的看法多半对项羽的做法给予否

定，认为项羽不听臣言、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也正是项羽这些性格弱点，酿成了其最终输给刘邦、自刎乌江的结局。

然而，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当时历史背景，重新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比如学者张志坤在《鸿门宴楚汉得失之我见》一文中，认为鸿门宴实际上是项羽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夺得关中，既降伏刘邦又维护了自己反秦盟主的地位；而刘邦忍辱负重，拿土地换得渡过难关，仅此而已。

学者周骋在《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一文中，认为鸿门宴是因为当前的形势而导致项羽不得不安抚刘邦。就大局而言，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学者蔡伟更是高度评价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

而对这些说法，学者张斌荣又进一步反驳说：“刘邦之失关中乃时势使然，不得不送。刘邦表面看损失确实很大，但从政治、战略上看，刘邦是以不得不失换取了很大的利益，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胜利，因此，得大于失。”项羽兵不血刃拿到的是本来就可以拿到的，刘邦失去的是本来就要失去的。而项羽却失去了杀刘邦的一次机会，给了刘邦坐大的机会，没有把潜在敌人扼杀于摇篮之中，消灭于隐患之间。如此看来，项羽并没有拿到最大的利益，仅仅拿到本来就是自己之物。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九)——延平门

(隋唐长安外郭城西面偏南门,遗址在今西安西南郊唐延路中段路西)

1.唐蕃会盟延平门西

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唐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次相尚结赞会盟于清水(今甘肃清水县)。但“清水之约,疆场不定”,尚未划定双方疆界,于是唐德宗遣使崔汉衡入蕃,与吐蕃赞普直接面议而决,最后完成了盟约。同年七月壬辰(十七日),唐德宗命宰相李忠臣、卢杞、关播,右仆射崔宁,工部尚书乔琳,御史大夫于颀,司农卿段秀实,少府监李昌夔,京兆尹王掬,左金吾卫将军浑瑊等诸多大臣将军与吐蕃相区颊赞再次会盟于京师长安。这次会盟的场所初次选定在长安外郭城西南延平门内北侧的丰邑坊,后因“以丰邑坊盟坛在京城之内非便,请卜坛于京城之西”(《旧唐书·吐蕃传》),遂改在延平门外会盟。会盟仪式隆重,众官皆朝服升坛,坛下环列仪仗兵卫,由宰相关播跪读盟文。盟毕,德宗赐宴庆贺。

2.百官送李光弼出殡延平门

李光弼(708~764),唐大臣、武将。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契丹酋长李楷洛子。有勇谋,善骑射,能读《汉书》。曾任河西节度副使、朔方节度副使等职。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与郭子仪进攻河北,收复十余郡。又在太原击败史思明。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官拜太尉、中书令,封临淮郡王。广德二年(764年)七月,死于徐州,部下拥灵柩还京师长安。同年十一月,葬于今陕西富平县觅子乡,出殡之日,“帝遣使吊卹其母,赠太保,谥曰武穆,诏百官送葬延平门外”(《新唐书·李光弼传》)。

3.延平门内李晟林园

延平门内北侧的丰邑坊,有德宗时名将西平郡王李晟御赐林园。

李晟(727~793),字良器,唐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有才略,善骑射。18岁投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军,于陇、蜀之地屡破吐蕃、党项,立战功,号称万人敌。德宗建中初,统神策军赴剑南破吐蕃,又讨伐河北诸叛镇。建中四年(788年),朱泚反长安,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他率军赴援。次年,李怀光叛,德宗奔梁州(今陕西汉中),他屯军东渭桥,收复长安。李晟因功官拜司徒,兼中书令,封西平郡王,德宗并“赐永崇里第及泾阳上田、延平门之林园”(《旧唐书·李晟传》)。唐李晟延平门林园旧址约在今西安西南郊唐延路中段路东新纪元公园之西。



西安北客站

西安北客站位于西安市北部中轴线未央路和三环路、绕城高速公路衔接处,距西安市中心 12 公里,距咸阳市中心 21 公里,是西安的重要铁路交通枢纽。

车站一次性建成南北双向客运站房、双向站前广场和双进双出的规模格局。车场为 3 场 18 站台 34 股道。

车站建筑风格寓意“唐风汉韵、盛世华章”,既体现现代交通建筑跨度大、结构新、通透快捷的特征,又彰显历史文脉与现代科技的和谐统一。是一座集先进性、经济性、系统性、功能性和文化性于一体的现代化客站,是国家特大型铁路旅客站。

西安火车北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中转站。在规划区内形成集铁路客运、中长途公路客运、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公交、出租汽车、社会车辆于一体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中心以及为其配套的生活居住、商

贸服务设施。

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北客站定为主客站,逐步取代现有西安站的功能,是西安铁路枢纽及将要建成的全国快速高速客运网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集铁路客运、中长途公路客运、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公交、出租汽车、社会车辆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火车北站的建设改变了西安只有一个主站的局面,缓解西安站带给旧城的交通压力。经过两年多的建设,西安火车北站已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开始运营。





长安区北张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逢学老人,向大家展示传统的古造纸工艺和魅力。

纸乡北张古镇 廿四景

◎ 邹圣周

(一)

- 1、北张镇,“九里三”,好大村庄。
- 2、蔡伦纸,全村造,源远流长。
- 3、村容美,满街巷,穰纸糊墙。
- 4、正月里,赛社火,游街转巷。

(二)

- 5、西河湾,苇园中,关雉吟唱。
- 6、泔河水,清泠泠,鱼儿翻浪。
- 7、文王阁,楼高耸,隔河眺望。
- 8、西高场,夏登临,天阔月朗。

(三)

- 9、观南山,美如画,万千景象。
- 10、南门外,学堂里,书声琅琅。
- 11、南小堡,“紫禁城”,声名远扬。
- 12、娘娘庙,雕画秀,金碧辉煌。

(四)

- 13、村中央,有古庙,彩塑城隍。
- 14、庙门前,龙旗杆,社旗飘扬。
- 15、村南北,两戏楼,逢会对唱。
- 16、三八月,两古会,热闹非常。

(五)

- 17、东门外,湿洼地,荷花稻香。
- 18、泔惠渠,向北流,碧波荡漾。
- 19、东西堤,树成荫,杨柳成行。
- 20、石拱桥,巧玲珑,江南模样。

(六)

- 21、东北巷,献花卉,百神殿堂。
- 22、泔水滨,梁家滩,芦花飞霜。
- 23、“眼镜潭”,好去处,垂钓神养。
- 24、周遗址,藏文物,汉陶瓦当。

【注释】:

1.北张镇:现西安市长安区兴隆街道北张村。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清朝末年“北张镇为长安八镇之一。”2007年西安市政协编辑出版的《西安古镇》一书中有专文介绍。

2.“纸乡”:是对北张村自古以来全村造纸“家家有作坊,人人是工匠”的称谓,《长安县地名志》载:“北张村是古代造纸作坊集中地,所产宣纸颇有名气。”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传承至今,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曾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祥云小屋”表演。

3.“九里三”:户县秦渡镇因面积大号称“九里三”。这里是说北张村村落之大。《长安县志》记载:“明清时,北张村为一里,里下七个社。”据传,北张村在明、清建镇时,众人因其与邻近的户县秦渡镇大小相当,因而也将北张村称为“九里三”。



周至民间舞蹈 “牛斗虎”

◎ 富小云整理

周至民间舞蹈“牛斗虎”，是当地八家庄村的一种社火表演节目，表现老虎伤人，青牛救主(牧童)的故事。早在清乾隆年间，该村就有“牛虎斗”表演，距今最少有 300 年历史。

从事“牛斗虎”表演的主要是该村赵家一门，赵家的“牛斗虎”传男不传女。老虎和牛的道具用竹子、麻纸、油布、颜料等材料制成。两人舞牛头、虎头，两人演牛尾、虎尾，一小孩扮演牧童。虎牛舞斗起来，紧张激烈，进退有序，该舞蹈以锣鼓等打击乐器伴奏，节奏欢快，激烈昂扬。该舞蹈的音乐完全是随着场上演出的情节而掌握节奏的。“牛斗虎”中虎的动作有 72 势，如翘虎势、搜山势、望山势、捕食势、上山势、下山势、跳涧势……分别刻画老虎的勇武、精明和顽皮情态。牛的动作有 36 势，有犀牛望月、翘叉舔背、吃草、缩叉、挖耳等动作，表现牛的稳健、

壮美和朴实。因“牛斗虎”是以武为舞的，所以，“牛斗虎”表演前，必有一段长拳表演。“牛斗虎”中的许多套路就是从武术套路中演化出来的，如“怀中抱月”、“金鸡独立”等，都是很典型的武术动作。源于该村村民自古以来就有习武的传统。他们的武术属于“少林派的洪拳”。

2007 年 5 月，周至“牛虎斗”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被确定为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十大雷人吝啬鬼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富而且贵的吝啬之徒，好多还是身居要职的官场之人。现根据古籍记载对其进行盘点，择出十大最吝啬的古代官员供各位看官观瞻。

1.曹洪。三国时期的曹洪，是曹操的堂弟，曾数次舍命救过曹操，随曹操南征北战，屡屡征伐有功，被拜为都护将军。曹丕称帝后，任曹洪为卫将军，再升骠骑将军，封野王侯，后再转封都阳侯。曹操任司空时，亲自带头将每月调储在县，曹洪所储之款连曹操也自认不及。《魏略》中记载，曹洪敛财有术，是曹操手下诸人中的第一巨富。曹洪却吝啬刻薄，为此差点丢了小命。

事情是这样的：魏文帝曹丕还在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找曹洪借一百匹绢。曹洪觉得肉痛，百般托词不愿意借，结果惹恼了曹丕。一直怀恨在心的曹丕即位后，找了个由头把这位堂叔下到狱中，准备处死他。后来幸得卞太后求情，曹洪才免于死，但被施以削官职、减爵位之处罚。

2.王戎。《世说新语》“俭嗇”中说，王戎生性吝啬，他的一个侄子结婚，作为伯父的王戎当然要随个份子：“送他一件单衣”。但是，过后王戎心疼不已，又跑到人家家里给要了回来。

就连对自己的女儿，王戎也没大方到哪里去。王戎的女儿嫁给了裴家的公子，从老爹这里借了好几万的钱。女儿回娘家的时候，忘了归还老爹的那几万钱，结果惹得自己的亲

爹很不悦，王戎的女儿赶紧将钱还上，这种情况下，王戎“乃释然”。

王戎十分富有，《世说新语》上说他“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但吝啬成性的他对日常消费却没有任何兴趣，一心想让蛋生蛋，钱生钱。家里种出了上好的李子，他便高价出售，但害怕别人用他的李子做种子栽培出好李子，就事先把李子里面的核给拿掉。王戎每夜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3.周札。东晋年间，右将军周札一家五人封侯，身居要职。周氏势力的发展，遭到权倾天下的王敦的猜忌。于是，王敦悄悄联合江南的沈氏士族共同讨伐周札。等周札得到消息，已是兵临城下，仓促间准备率领几百名部下出城迎敌。

在周札的库房中，存有一批打造精良的兵器，手下都劝他赶紧拿出来装备士兵，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周札竟然舍不得，遂将劣质兵器分发给士兵。见周札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依然如此吝啬，士卒也没有为他卖命的决心，结果在敌军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周札遂被杀。这个因吝啬而送命的周札，其父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曾斩蛟伏虎的周处，他是周处的第三个儿子。

4.萧纪。南北朝时的武陵王萧纪，是梁武帝的第八子。史载，萧纪曾率军攻打江陵，他熔金成饼，100个金饼一篮，装了100多篮，高

●文史拾趣●

高挂起，而银子则是金子的五六倍之多，还有各种绫罗绸缎，不计其数，以此激励将士英勇杀敌，但这位吝啬鬼只不过是让大家饱饱眼福而已，每战结束从不论功行赏。军心大乱，叛逃者十之八九，在很短的时间内两岸十四城俱降，萧纪兵败如山倒，自己也在乱军中死于非命。

5.元宗逵。明·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唐朝时有个元宗逵，官为果州司马。他家有婢女死了，就吩咐值班的管家说：“我家的老婢女死了，她在我家听使唤有年头了，应该为她找一口棺材入殓出殡。我初来乍到，家里穷得很，买不起新棺材，只要买到能用的就行。你也不必说是我家要买，就说是你们家要买就行了。”管家出门把元宗逵的这番话说给大家听，一州人都在笑话这位司马太小气，都把他的这番话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

6.郑仁凯。《朝野僉载》记载：身为密州刺史的郑仁凯真是惜钱如命，且很搞笑。他家中有个小厮，央求他给买一双鞋，郑仁凯说：“这事好办，我为你找一双鞋来。”不一会，门夫穿着鞋进来，郑仁凯故意支使门夫爬到树上掏鸟窝。门夫脱了鞋爬上树，郑仁凯就偷偷让小厮把门夫的鞋穿走。等到门夫下树，遍寻鞋子无着，只得打赤脚走了。郑仁凯竟然为此非常得意。

7.韦庄。五代时期的大词人韦庄，名满天下。而他的吝啬，也与他的词一样著名。韦庄每次做饭，下多少米都有固定的分量；做饭烧的柴，也要事先称好；若是吃烤肉，哪怕是少了一片他都会知晓。韦庄有个儿子，八岁时夭折了，入葬时，妻子为孩子穿上生前的衣服，却被韦庄剥了下来，只是以孩子原来睡的旧

草席包裹着埋了。而且掩埋之后，韦庄还把草席带了回来……

8.张允。五代的后汉时期，吏部侍郎张允也以吝啬而出名。就算是自己的妻子，张允也不会多给她一文钱。他害怕妻子偷偷地拿他的钱用，就把各种钥匙都别在腰间，走路来叮叮当当乱响，乍一听像是个身上挂了很多耳环首饰的女人。郭威兵变后，张允躲到一个破庙里勉强逃了性命，可是却让兵丁把他的钥匙一股脑全给抢了去，等他回到家里一看，早已被抢劫一空，张允心如刀绞，哇的一声，鲜血狂喷，不到半日，竟一命归阴。

9.李越。宋·陈元靓《事林广记》记载：李越归明人，作蔡州上蔡县令。李越很是小气，处事多让人不好理解。他们家一年到头很少吃肉，每到腊月初八祭祀祖先的时候，就派采购人员到肉行里借熟肉一斤回来放在盆中，再用几个碟子盛钱数文，这样来祭祀祖先。并祷告说：“酒是我用做官的钱买来的，清醇可爱；肉是我从肉行里借来的，新香可吃；因为事忙没来得及买果子，就用钱当果子吧。”等祭祀完毕，就拿着肉招呼采购人员说：“快还到肉行里去。”人们都笑话他太吝啬了。

10.汤斌。清代康熙年间，江宁巡抚汤斌被尊为“理学名臣”，是当时程朱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汤斌一生以清苦的生活砥砺名节，其为人之吝啬十分出名。据文献记载，这位老先生有一天心血来潮，查看家中账本，发现上面开了一只鸡蛋，顿时大怒：“我来到苏州还从来没有吃过鸡蛋，到底是谁买的？”下人答说是公子。他便把儿子招来，罚跪在庭下，数落道：“你以为苏州的鸡蛋与河南是一样的价钱？你想吃鸡蛋，就回河南老家去……”



历史名流中的 “高考移民”

在古代的高考移民中，大名鼎鼎的诗人白居易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读《白居易年谱》，瞧出来一点小猫腻：白居易祖籍山西，生在河南，户口则属于陕西省渭南县下邽镇。他要参加科举考试，应该去陕西渭南才对，但他乡试那年没去渭南，而是去了安徽宣城报考。这在唐朝可是违法行为，因为唐朝法律规定，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必须在其户口所在地报考。白居易之所以去安徽报考，就是因为当时安徽的录取率比较高。

大诗人王维也是如此，他本应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市西）考试，但王维善弹琵琶曲，博得了某公主的欢心，在其干预下，王维在京兆府应试。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说过：“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意思就是首都地区录取率非常高，一个长安城取中的

人数竟然跟一个大省取中的人数差不多。

不光唐朝，两宋和明清也是这样子。北宋时，江南考生多而录取少，很难考中；北方考生少而录取多，容易考中。明清时，内地考生多而录取少，很难考中；边疆考生少而录取多，容易考中。录取率低的省份 100:1，录取率高的省份 10:1，地域差别如此之大，自然让考生们眼红，纷纷玩起了“高考移民”小把戏。

“高考移民”未必是真的移民，很多考生只是弄一假户口罢了，这种为了取巧投机，假冒他省之籍投考者，称之冒籍。

我国近代的实业家、政治家、清末状元张謇，在参加童生试时，也是冒籍考中的。

张謇是江苏省海门县常乐镇人，那时海门属于通州，由于其世代务农，祖上没有参加科考之人，在其老师宋璞斋的建议下，认一如皋人为祖父，更名张育才，同治七年，他在如皋参加科举考试，并顺利通过童生试中的县试、州试，并且在最后院试时名列前茅，获得秀才称号。

本来考中秀才是很高兴的事，谁知道他冒认的祖父是一个抽大烟的破落户，为人阴险狡诈，借机向张家勒索财物。在遭到张謇的拒绝后，“祖父”竟向官府告发张謇不孝。同治十年四月，张謇听说官府要拘押他，就连夜冒雨潜逃了。

最后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謇主动请求革黜秀才身份，让其回通州原籍考试。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一些正直官员的支持，最后经礼部核准，同治十二年，张謇被划归通州本籍秀才。光绪十一年，张謇中顺天乡试，成为举人。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行恩科会试，张謇得中状元。

古代的“医疗纠纷”

古代也有庸医,既然有“庸医”,“医闹”也就在所难免,于是很不幸发生了下面的故事:一医生医死人,主家愤甚,呼群仆毒打。医下跪求饶,主曰:“私打可免,官法难饶,即命送官惩治。”医畏罪哀告曰:“愿雇人抬往殓殓”,主人许之。医苦家贫,无力雇募,家有二子,夫妻四人共来抬柩。至中途,医生叹曰:“为人切莫学行医!”妻责怪夫曰:“为你行医害老妻!”幼子曰:“头重脚轻抬不起!”长子曰:“爹爹,以后医人拣瘦的!”

这个故事中的医生还算幸运,只需“帮助抬柩”就万事大吉,还有比较倒霉、相当有才的赔偿方式,那就是要求“恢复原状”:一次,一个医生医死人儿,儿父要告官,医生以自己的儿子作了赔偿;第二次,这个医生又医死了人家的仆人,只好又把自家仅有的一个仆人赔了去;不料当晚,又有人敲门说:“我家夫人产后有病,劳烦医生去给看看吧。”医生行前对老婆说:“可恶!准是他家的男人看中你了!”

客观上说,古代医疗纠纷确实有,但闹得太凶的并不多。

古代医生从小就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州县行医者一般毕业于中央卫生院并通过考核有执照,而且古代有“不成良相,便为良医”的优良传统,视医术为“仁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古代

交通不便,老百姓看病不像今天,很容易去省城,一般去附近民间诊所,于是,对“口碑差”的医生,老百姓马上能用脚投票,根本无法生存,因此,除了技术原因外,故意乱用药、过度医疗、谋取钱财等违反道德的事,在当时无异于自取灭亡,实在比较少见。

尽管少见,但不等于没有,有了医疗事故,除了“私了”解决外,历朝官方是啥态度呢?

曾担任秦国太医令(卫生部长)者提出:“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意思是每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按照考核结果奖励或克扣其俸禄(以制其食)。这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医疗事故,除了影响医生待遇外,医师并不承担责任,患者只能怨没有碰到“十全”的医师了。

唐朝以前,医疗纠纷大多由民间有声望的人帮助调解解决,责任医生不会受法律处罚(华佗因涉及政治,不在医疗事故之列),但到了唐朝,首次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对责任医生的惩处。唐律规定: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者,处以流放;伤人的,以故意伤害论;虽然不伤人,但只要有过失,也要进行杖责。

明清时期,处理医疗纠纷进一步细化,特别是对于责任认定,法律出台了“由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的制度:“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

验。”即对责任事故,不由当事医生自说自话,而是由官府指定其他医生(别医)进行鉴定,如此既可确保公正,受害者也易接受。

清律对于责任医生,不再像以前那样搞“刑法伺候”,而是吊销医疗执照和经济赔偿,比如说清朝规定医生因失误致病人死亡,要赔偿病人家属十二两五钱,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数年的收入。

古代对庸医的处罚,大致经历了“宽—严—宽”的轨迹,这与古代文化密切联系,民间有“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治得了病、救不了命”的说法。历代皇朝也都鼓励仁义、中庸、与人为善的民风,大力制约医闹中的“刁民”、讼棍,这些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民众对待失误医生的态度。

古代除了按照法律规定追究普通医疗事故外,也经常有一些证据确凿的特殊“医疗事故”,主治医生却无法得到惩处,这是咋回事呢?

北宋哲宗皇帝,听说老宰相韩绛生病了,而且食欲不振,便说自己正在服用的金液丹可以开胃,“提举翰林医官院”(中央医学院院长)得旨后,逐级传达,主治太医哪敢不遵旨?结果老先生年迈,精气已衰,抵不住金液丹的阳亢,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一命呜呼。宋朝京城有句话很流行:“宣医丧命”,意思是:只要是皇帝叫医生给你治病,你就准确打

点行装,去阎王那里报到吧。皇帝对医学一窍不通,如果他一时兴起,按照自己的体会帮你治病用药,那你还有命吗?

古代“医疗事故发生率”,国办医院比民间医院还要高,而且发生医疗事故也大多不了了之,个中缘由让人哭笑不得。古代中央医疗机构的主事,大多由不懂医的宦官担任,特别是对高级官吏的治疗,大多规定由不懂行的宦官现场监督,理由是“防止医生搞小动作”,如此荒唐可笑的行政干预,医疗事故也就不胜枚举了。不仅如此,即使是皇帝“中招”也不乏其人,责任就更难追究。比如唐太宗、明朝嘉靖、隆庆等皇帝不信科学信巫术,嗜好吃金丹,以求长生不老,结果提前撒手人寰,此种医疗事故,你说责任由谁承担?而那个喜欢做木匠的明熹宗朱由校,因“吃红丸”而命丧九泉,究竟是“谋杀”还是“医疗事故”,依然是千古之谜。





清代旗女的旗袍，等级分明，制度浩繁。而民国旗袍的出现，将中国等级森严的冠服制度抛于脑后。作家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说道：“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西方审美情趣中的曲线之美，引发了旗袍式样的变革。旗袍在长短、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展开“较量”。

到 1929 年，长短适中的旗袍开始变短，下摆上缩至膝盖。1931 年后旗袍又流行

民国旗袍 “进化史”

变长，下摆下垂。同时，原先能遮住手腕的旗袍袖子缩短至肘部。以后袖长越来越短，缩至肩下两寸，1936 年后几乎无袖。高耸及耳的领子也逐渐变低，后来竟有了无领旗袍。

旗袍开衩也越来越高。起初，旗袍悄悄地在左边开了低衩。后来衩越开越高，渐渐高及膝部，高到大腿，以 1934 年为最高，乃至到达臀部，而后又逐渐降低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当时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以“有伤风化”为由，下令禁止妇女穿旗袍。有时，他在街头看到年轻女子穿旗袍，便会紧皱眉头，双眼紧闭，甚至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自己“非礼勿视”。

也就在这个时期，旗袍的“九翘三弯”：头、肩、胸、颈、腰、腿、臀及手足“九翘”，配之以领、衣襟、衣角的“三弯”，几成定型。旗袍逐渐成了各年龄段、各阶层都能接受的主流服饰。



历史上『一语成讖』的巧合

一语成讖是指一句无心的话，竟然不幸被言中。古往今来，这样的故事时有发生。

唐代崔曙自小孤贫，却喜好诗书。开元二十六年，崔曙应试，作《奉试明堂火珠》，诗云：“正位开重屋，凌空出火珠。夜来双目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遥知太平代，国宝在名都。”考官十分推重颌联“夜来双目满，曙后一星孤”，唐玄宗也大为欣赏，取其为状元，官授河内尉。可惜，崔曙第二年就病故了，留下一女，其名恰是“星星”。世人皆以为“曙后一星孤”是讖语。

1935年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这副贺联的联语曰：“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对黄侃的勤奋称誉有加；下联以蔡邕《曹娥碑》的典故，希望黄侃今后早日著书行世，嘉惠后学。可见，章太炎的这副贺联，完全是对弟子黄侃的激赏与勉励。可黄侃接到贺联后，脸色骤变。原来，联中无意间藏了“黄绝命书”四字。果然，是年10月初，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1933年4月，郁达夫从上海移家杭州，郁达夫的学生赵龙文经常前去拜访。1935年，郁达夫举债筑一新居，自署“风雨茅庐”。当时，赵龙文是当地的警察局长，却也喜欢舞文弄墨，他在扇面上题写了两首诗赠给郁达夫。郁达夫就原诗和之：“卜筑东门事偶然，种瓜敢咏应龙篇？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令人惋惜的是，诗中的“苟活人间再十年”竟成讖语。10年之后的1945年8月，郁达夫流亡于苏门答腊，一天夜里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后被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荒野中，年仅50岁。

中国在北宋时期已存在慈善机构

河北省邯郸市文物部门对磁县一处北宋时期贫民“公墓”研究考证后认为，北宋时期，我国已有福利慈善机构的存在。这也为研究宋代社会下层贫民生活以及国家的救助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

据介绍，在古代，统治阶级为了实行仁政，通常会设立一些福利慈善机构来缓和社会矛盾。北宋政府也非常重视风俗教化功能，官方福利慈善事业比较发达。北宋时期，宋国与元、金战乱频仍，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战乱中多有客死他乡无人认领的尸体，也有因家贫而无力丧葬者。为安葬这些死者，北宋朝廷专门设置“漏泽园”，来收殓无人认领的无主尸体或者因家贫无力埋葬者，集中埋葬。因此，“漏泽园”就是国家安葬贫苦者骸骨的公共墓地。

在文物普查中，邯郸市文物部门在这个市磁县发现了一处埋葬因战乱、饥荒而死亡的北宋时期贫民的“公墓”。这一“公墓”位于磁县观台，南北长约1000米，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且密度较大。发掘的墓葬内都有墓志，墓志铭中有顺序编号、死者和有关家属姓名，以及葬埋日期等内容。

碑林区、莲湖区率先完成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

至 10 月底,碑林区和莲湖区已按市政府办公厅要求,率先完成《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碑林区资料涉及 21 个村(社区),

10 多万文字(含《北沙坡村志》),近 200 张新旧照片。莲湖区涉及 35 个村(社区),文字和图片资料均比较齐全。

面对村落历史 重拾遗存记忆

《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开展以来,新城区农村工作局按照市、区要求,迅及着手安排部署。一是责成专人负责,配齐配强人员,进入工作状态;二是从硬件设施上予以支持,购置扫描仪等专用器械,重点解决历史照片的处理等难题;并要求局办公室相机随时备用;三是召集各村负责人专题会议,要求全力配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此项工作。

主要采取以下方法:一是找准切入点,从基础工作铺开入手。于 5 月中旬向基层再发通知,明确工作方向、工作任务,明确工作内容,要求落实到人,与局建立业务工作联系,畅通联系渠道。二是不坐等资料送上门,坚持走下去,入村甚至入户征集。二是加强座谈、调研,解决村史模糊与疑难问题。四是行动迅速,具备时空跨越感。如前期获知新兴村与南张村将于不久陆续拆迁消息后,我们当即前往两个村进行拍照留存。

目前,已基本完成 5 个村简史的整理、文字修改、内容完善,收集整理 6 个村的部分历史照片,基本完成了一次对各村现状的拍摄工作,正在进行全面整理中。

(新城区农村工作局)

阎良区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进展情况

阎良区地方志办公室在承担《阎良区志》(续志)总纂工作和《阎良区年鉴》撰写工作的重压之下,为了完成《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区地方志办公室指定专人和分管领导,同时结合区志总纂资料补充工作,向全区七个街镇下发通知,传达市政府办公厅文件精神,对征集工作内容的近 20 条要求,列出了详细的提纲。

阎良区现有两镇、五个街道办,下辖 80 个行政村、332 个自然村、592 个村民小组。资料征集比较复杂。各镇街按照编纂要求,精心组织,落实责任,确定联络和撰稿人员。通过调查走访、查阅文献,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积极搜集村情史料。区志办对资料进行了反复整合,目前已完成 30 个行政村的资料撰写,约 10 万字,完成全部任务的 37%,其他村落资料正在整理、修改及完善之中。

(阎良区地方志办公室)

未央区三项措施扎实做好 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

为客观记述区域村落变迁情况,保存村落文化遗存,未央区严密部署、精心安排,三项措施扎实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一是高度重视。迅速下发《关于做好未央区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未政办发〔2012〕8号),明确指导思想、组织实施和工作要求。各街道办事处也迅速召开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动员会,明确分管领导和联络人员。二是精心组织。安排专人收集整理地方志、年鉴、族谱等文献资料,做好复制、整理和归档工作,针对近年来区域城中村改造工作强力推进、撤村建社区情况较多的实际,加快对村情资料,特别是对城中村改造后农村转为

社区的村落资料征集工作进度。同时,广泛吸纳辖区热心村落记忆工作的退休老教师、熟悉乡土人情的年长者参与资料征集工作,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合理分工协作,力求掌握真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三是严格审核。对各村上报的村情资料,由街道办事处进行初步审核;初审无误后,由街道办事处报区地方志进行复审把关;最后由区政府统一组织上报,三级审核制度,有效保证了村情资料文稿的准确性和高质量。目前,汉城、辛家庙、大明宫街道已上报47个村的村落资料,其中,新房村、广大门村等村落资料已进入复审阶段。

(未央区政府办)

蓝田县西安村落记忆 资料征集工作进展情况

按照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统一安排部署,为了记述蓝田村落变迁情况,保护我县村落的文化遗存,2012年3月,县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县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镇组织专人征集撰写相关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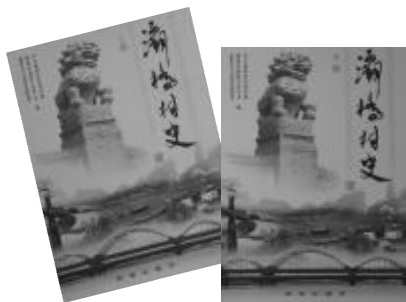
蓝田县共有22个镇519个行政村,面积1969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共有安村、汤峪、小寨、葛牌、洩湖、辋川、华胥、灞源、九间房等9个镇完成初稿并上报县政府办公室,经县志科初审修改后返回各镇补充修改。目前安村(27个村)、汤峪(26个村)、小寨(24个村)3镇已补充修改完毕,送领导审阅后可定稿。其他各镇村落资料正在征集整理中。

(蓝田县县志科)

由灞桥区区委宣传部、灞桥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和灞桥区灞桥文化学会负责编辑的《灞桥村史》于2012年5月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灞桥区224个自然村多年来自然景观、村民生活、文化教育、产业发展、历代名人等情况。该书图文并茂,共计55万余字。

(何彩云)

《灞桥村史》出版发行



“老头子” 原来专指乾隆



“老头子”是个民间俗语，年老的男子通常被称为“老头子”，老夫老妻之间，妻子也可以昵称丈夫为“老头子”，帮会里面的首领也常常被称为“老头子”。可是，鲜为人知的是，这个词最早却是对乾隆皇帝的专用称呼。

纪昀，字晓岚，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深为乾隆皇帝所激赏，任命他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最有名的著作是《阅微草堂笔记》。

纪晓岚身体肥胖，所以最害怕的就是夏天，一到酷暑季节，人们常常看见纪晓岚身上的衣服总是湿漉漉的，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他掉进了池塘里呢。

在南书房陪同乾隆皇帝吟诗作画虽然是荣耀之事，但纪晓岚却视如畏途，因为里面太热，自己汗流浹背的样子实在太过狼狈。因此一出了南书房，纪晓岚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旁边的便殿，把湿漉漉的衣服脱个精光，纳完凉后才出门回家。

乾隆皇帝听贴身的太监说过纪晓岚的这个习惯，有一次想故意戏弄纪晓岚，趁纪晓岚和别的大臣们在便殿里裸体聊天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了便殿。一看皇帝驾到，大臣们赶紧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偏偏纪晓岚是个近视眼，乾

隆走到跟前才看见，这时已经来不及穿上衣服了。纪晓岚就这样赤裸着肥胖的身体跪在地上，不停地喘息着，一动不敢动。乾隆皇帝一直待了两个小时，坐在那里不言不语。纪晓岚终于忍不住了，跪在地上偷偷张望，可是看不清乾隆到底还在不在殿里。过了一会儿，纪晓岚实在忍无可忍了，小声问身边的大臣：“老头子走了没有？”众人大笑，乾隆皇帝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乾隆命太监为纪晓岚穿上衣服，吩咐他跪在地上，问道：“你为什么如此轻薄地称呼我？太过无礼！今天你必须说出个子丑寅卯，否则就砍了你的头！”

纪晓岚回答道：“‘老头子’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京城里的人都这么称呼您。大家都称陛下您‘万岁’，‘万岁’还不老吗？皇帝又叫‘元首’，‘元首’不就是头吗？皇上是天之子，而又以万民为子，因此叫‘子’。合称‘老头子’。”

听了纪晓岚的这番诡辩，便殿里哄堂大笑，乾隆皇帝也笑得合不拢嘴。纪晓岚既为自己解了围，顺便也大大地拍了乾隆皇帝的马屁，真是机智，弄得乾隆皇帝没办法怪罪他。从此之后，这个词就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流行起来了。

元朝皇帝 为什么没有陵墓？

元朝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元朝墓葬的特殊性。像成吉思汗的陵墓,据说在把成吉思汗埋葬后用万马踏平,参建者殉葬,在陵墓上当着母骆驼的面把小骆驼杀死,以备来年祭祀时让母骆驼寻找墓地。因此元朝皇帝的陵墓不为外人所知,也很难找到。

另外,元朝皇帝死后的安葬仪式很简单。皇帝死后,用两片厚木板按人形大小凿空,把遗体放入,再将两块木板合上,就成了皇帝的“棺材”。然后挖一个很深的坑,把“棺

材”埋下去,用很多马把这里踏平,不留任何痕迹。同时派兵封锁住这一地区,不准任何人入内,等长出青草,与四周地面相同时,这些兵才撤走。这样,长眠于地下的皇帝们方能免去盗墓贼之类的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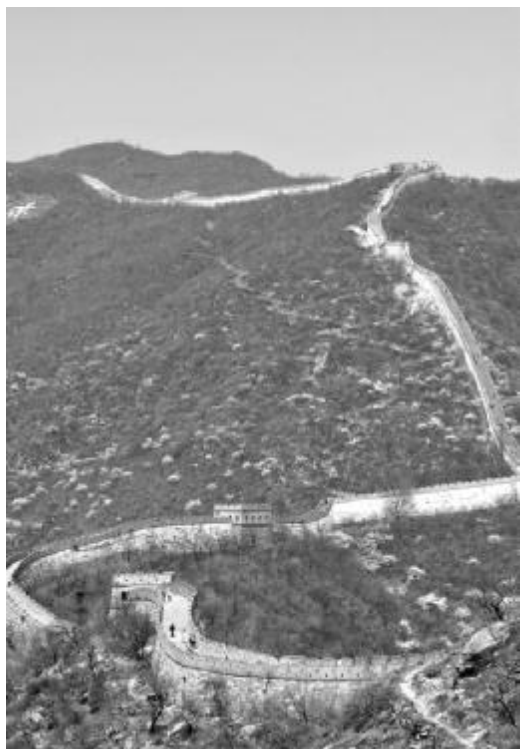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仪式就是天葬,不过这种传统现已消失了,就是把死者用好的缎子(丝绸的一种)放在一辆平板小木牛车上,任牛跑,尸体掉在那那就是安葬地,所以蒙古皇帝的安葬有一定的随意性,不容易找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由来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已经走过了 80 多年的光辉战斗历程。然而,时至今日,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究竟最早始于何时,使用情况如何,其历史根据是什么,在党史和军史界仍说法不一。

“解放军”称谓最早始于何时?一种意见认为,最早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于 1944 年 9 月 22 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的,他指出:除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10 月 7 日,在讨论组织河南军区问题时,刘少奇又提出:河南军区受延安指挥,以河南人民解放

军的名义出现。从而认定这是最早提出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首次出现在中央军委于 10 月 14 日致新四军第 5 师的电文中,指出:从陕北派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也有的意见认为,最早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司令朱德于 1945 年 8 月 11 日,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面反攻阶段的受降命令中,提出了山西解放军的称谓。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包括各路解放军和山东解放军等称谓,虽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出,但未正式使用。这些观点,均值得商榷。



“万里长城” 并非“一条线”

“万里长城”在世人心目中是一条巨龙般的墙，然而考古专家调查发现，明代长城的许多地方有两道，表明“万里长城”并非是一条简简单单的防卫家园的墙。

主持陕西省明代长城资源调查的西北大学教授段清波说：“明长城在许多地方不是一道，有的地方有两三道。譬如陕西省境内明代长城，整体上就由两道修建时间有先后、走向基本平行的长城组成，这表明长城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一条线，长城地带十分复杂。”

据了解，明代长城与秦长城一样，都是主要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边防工事，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进行交流的主要地带。虽然明代长城 1987 年即成为中国首

批世界文化遗产，但囿于其线长、体大、山险等原因，其具体资源情况长期不明。

段清波说，中国国家文物局于 2006 年启动了为期十年的长城资源调查研究，目前整体资源情况已基本清楚。以陕西省境内明长城为例，我们共对 398 段，长 1170.2 千米的长城、1497 座单体建筑、115 座关堡、52 处相关遗存、45 座营堡等开展了合乎国家规范要求的调查。

经调查，主要修建于 15 世纪的陕西省明长城地处毛乌素沙漠东南边缘以及白于山地，自东向西经过榆林市七个县区，东北连接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境内长城，西南连接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境内长城。因防御之需，明长城由两道即俗称的大边与二边共同组成，整体走向是东北—西南方向，呈现出平行线的分布状态。

作为一种复杂的防御工事，明长城的大边与二边之间，设置着许多驻军的营堡，通过长城的烽燧、关堡等，共同构筑成一张敌情信息和兵力布置的军事网络。可以说处于大边后方的二边长城，主要利用的就是地理和信息优势。

实际上，除陕西省境内有两道之外，明长城自居庸关以西，分南北两线到山西偏关会合，也被称为内、外长城。

段清波说，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初步掌握了营堡与长城墙体、单体在防务上相互协作的具体关系。调查清楚了明代延绥镇大边长城的分布和保存现状，以及二边长城的分布规律、走向以及防御方式等，对于进一步保护长城，并深入理解长城地带的人文与战争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最早的城市是西周丰镐

当我国历史发展到夏商时期时，出现了一批规模较新石器时代古城大许多的城址，特别是当时几座主要都城，如河南登封市王城岗的禹都阳城遗址、偃师

市二里头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以及郑州市商汤亳都遗址、安阳殷墟商代后期都城遗址等。但从史籍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论，它们也只具有“祀与戎”的政治、军事功能，尚不具备“城市”的多方面职能。

商代晚期，周族在关中平原崛起。至文王时，在今西安市西郊之沔水西岸建立丰邑。其子武王继位后，在沔水东岸营建镐京。丰、镐二京隔沔水相望，实为一城。武王以其作为政治中心，励精图治，历 12 年，东向灭掉殷商王朝，使周王朝成为中华大地上替代商王朝继起的华夏一统的强盛王朝。

丰镐作为西周主要都城，又被称为“宗周”。西周末年，丰镐为犬戎族攻入，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丰镐遭战火焚毁。之后在秦始皇修阿房宫与汉武帝修昆明池时，镐京遗址遭到进一步破坏，整个城址的规模与布局已很难全面复原。经近现代多年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沔水两岸约 15 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只发现了多座

宫殿、宗庙、贵族与平民居址、车马坑、青铜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业作坊。此外，据《诗经》等文献记载，还当有辟雍、灵台、灵沼等礼仪和游乐性设施。

特别是记载都城丰镐规制、并成为后世都城设计圭臬的《周礼·考工记》中，明确记有“前朝后市”这一规划与建筑内容，结合《周礼·司市》篇中所记，当时“市”已有多种类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同时，还设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从担负“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职能情况看，丰镐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再结合西周经成王、康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至中期工商业日益兴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从事工商业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这一历史发展状况看，丰镐城中不仅集中居住着一大批王族宗室与公侯贵族，还有人数不断增加的百工、商贾。他们与各类“市”相结合，使丰镐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经济功能也愈益突显出来，因而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

其始建年代，即文王徙都于丰之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研究确定的武王克商在公元前 1046 年与《史记·周本纪》所载相关内容推算，当在公元前 1059 年，距今已三千多年。





古代的 民办大学

古代的民办大学几乎聚集了当时的著名学者和大师。南宋时期的理学大师朱熹、张栻等都曾在当时的民办大学即学院里教书授课。

古代的民办大学带有点民间色彩、有远离官方腐朽科举制度的味道，无论是在教学体制、教学风格以及师资力量上，都可与今日国外著名大学相抗衡。比如在教学风格上，书院主要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辩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即使在今天这个教育制度弊端频出的社会，如此教学风格也是很不错的。古代的民办大学大都坐落在深山老林里，比如白鹿洞书院坐落在庐山五老峰上，嵩阳书院建在嵩山太室山脚。这样的学校地址，可以避开尘世纷扰，安静地做学问。“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理学大师朱熹曾向庐山发誓要把白鹿洞书院办好，并请了各方学者在此地讲学。

古代书院式的民间办学，起于唐朝时期，到晚清时期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旧时书院主要是一些社会上的学者名士隐居山里，然后靠自己的资产办学府。南宋时期，许多民办

大学就纷纷收入官府的编制当中。这种编制，主要是因为古代书院的办学力量来自于个人，未免显得单薄，因而长久下来难以支撑下去，必然要得到官府的救助。

古代的民办大学，对于入学者设置的门槛也是比较高的。岳麓书院，在南宋时期只招收定额的二十个学生，到后来才增加到三十个，这十个名额主要用于招纳远道前来求学的有才华青年学子。

进入学院后，一般也要穿校服，也有一定的请假制度，请假如果超过三个月就要受到停学处罚。吃住方面，一般都是学院提供。学习时间跟现在差不多，起床后会有晨读，然后是早饭后，午后以及晚上，共四段学习时间。学习内容一般都是儒家经典，教学方式往往以自学为主，兼以讨论和老师解惑。

对于在书院里讲学的人，古代一般称呼为山长。山长，一山之长，对于古代依山而居的民间学府，这个名字可谓非常合适。直至科举废除之后，山长的称呼才消失在历史的烟雾里。

由此可见，现代大学应该向古代民办大学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多多。

《过骊山作》



◎ (唐)杜牧

始皇东游出周鼎，刘项纵观皆引颈。
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傍穷百姓。
黔首不愚尔益愚，千里函关囚独夫。
牧童火入九泉底，烧作灰时犹未枯。

赏析

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是古人做饭用的锅。禹铸九鼎后，这鼎就从一般的炊器，变为传国重宝。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秦昭王时，秦灭周，想迁九鼎至秦国国都长安。“始皇东游出周鼎”字面意思是秦始皇出游东方，要把周代的九鼎运到都城咸阳，“出”的意思是“使出”，这句诗的意思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巡游天下。他拥有天下后曾巡游各地，于是引起刘项的“引颈”而观。项羽更是明确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吓得项伯赶快捂住他的嘴，告诉他这是要灭族的！可项羽后来还是真

做了当年想做的事。

“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旁穷百姓。”这两句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以下三种理解似乎都有道理：一种是秦始皇削平天下的确是十分辛苦，但应该是削平天下，让道路旁的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第二种理解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让天下百姓都变得贫穷了，“为”读阳平，制造出的意思。第三种理解，主语不是秦始皇，而是指刘邦、项羽，特别是指刘邦，原来不过是“道旁穷百姓”，一个小小的亭长，但却最终“辛勤”地“削平”了“天下”。

对于第一种理解，有人提出质疑，杜牧会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么？关于这一点，关键是看杜牧有没有民本思想。在《阿房宫赋》的末段，杜牧总结六国和秦灭亡的原因：“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这“复爱六国之人”不正是“削平天下实

●历代诗人咏长安●

辛勤,却为道旁穷百姓”么?

至于第二种理解,早在西汉贾谊《过秦论》中有这样的语句:秦统一天下后,“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也正是“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旁穷百姓”。

“黔首不愚尔益愚,千里函关囚独夫。”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其结果是“黔首不愚”,而不知体恤民心,不懂民本思想的秦始皇才是最愚蠢的:“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贾谊《过秦论》),而这自以为万世之业的固若金汤的崤山、函谷关,最终却成了作茧自缚,变成了囚禁自己的牢笼、埋葬自己的坟墓。

“牧童火入九泉底,烧作灰时犹未枯。”这

句诗所叙述之事肯定是诗人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所虚构的事:为寻找失踪的羊只,牧童误入被盗墓者打开的墓道,不慎引燃了地宫木材,导致整个秦始皇陵的毁灭,而此时的秦始皇尸骨尚未干枯。

杜牧创作了大量怀古咏史诗,诗人通过写这些昏君的腐败和朝代的覆灭,来劝诫当朝统治者要从中吸取教训,励精图治。所以,虽然吟咏的是前朝,着眼点仍在这个奄奄一息的社会,字里行间注入了作者深沉的历史感慨。这首诗也是这样,借评述古人之事,谏当朝统治者,希望接受亡秦残酷治民、治国而很快灭亡的教训,改而以体恤百姓,以民为本,其思想含义和其《阿房宫赋》是完全相同的。而从这一点来看,对“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旁穷百姓”的理解,选择第一种似乎更切合作者本意。

